百年前的一株兰

裘山山

在浙江兰溪，一个叫蒋畈的静谧村落，我见到一位女先生，她的名字叫王春翠。我没和她握手，因为她高高地站在白墙上，我只能仰视。

照片上的她，白发如雪，却并不显老态，身板笔直，面容平静温和。她的身边，是一位更年长的老妪，她的婆母刘香梅。从时间推断，拍这张照片时，她已经和丈夫曹聚仁分开很多年了，也就是说，婆母已经是前婆母了。但仅看照片，她们依然像一对母女。

之所以称王春翠为女先生，不仅是因为她是老师，她是校长，她是作家，更因为她在百年前的乡村教书育人，传播文明。她生于1903年，还裹着小脚，所以她的另一个称呼是“小脚先生”。

起初她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。因为我们去的蒋畈村被称为“曹聚仁故里”，而她，只是曹聚仁的前妻。

曹聚仁，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，亦是教授、作家、报人和社会活动家，留下很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。1950年赴香港后，为海峡两岸的沟通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，多次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，以爱国人士著称。故蒋畈村是以他为傲的。

他的父亲曹梦岐，也是大名鼎鼎。清末最后一科秀才。二十世纪初赴杭州应乡试，虽名落孙山，却带回了康有为、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。从此决心远离功名，以教育救国，将启民智、开风化作为己任，立志要培育一批能改变社会风气的人才。1902年春，曹梦岐倾尽私财，以祖屋为校舍，创办了育才学堂。校名之意，取自孟子的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。他自任校长，并兼教国文、修身，倡导学做兼修，知行并进，将一个愚昧落后的穷乡僻壤，带向了时代的前列。蒋畈有幸。须知在一个穷困之地办学育人，是精神上的开仓赈粮，是最大的慈善。曹梦岐功不可没。

在赫赫有名的曹家，出现了王春翠，不过是多了一名曹王氏。而王春翠走进曹家，也是源于育才学堂。育才学堂很开明，男女生兼收，于是王春翠便成了曹聚仁的学妹。曹梦岐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，个个都聪慧好学，其中的二儿子曹聚仁，天生聪颖，悟性极高，四岁便念完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五岁便念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。十一岁就在育才小学任文史课教师了，人称“小先生”。“小先生”第一次见到王春翠，就喜欢上了她。

在曹家留下的老照片里，我没能看到王春翠早年的样子。据乡间传闻，她生得眉清目秀，且十分聪慧，这一点，从晚年的照片里可以看出。两个少年是在村旁的通州桥上初相逢的，之后，他们就常去桥上“偶遇”，开心地谈天说地，或者静默地看着江水流淌。

我有幸走上了通州桥，很古朴的一座廊桥，平静的江水从桥下缓缓流过，桥头有一棵巨大的梓树，看上去像香樟，但树干上挂着牌子明确写着梓树，还写着它已有两百多岁了。那么，这棵梓树，是见证过曹聚仁和王春翠的爱情的。两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，一个十五岁，一个十二岁，美好而又单纯，单纯而又热烈。

曹王两家都很乐意达成这门婚事，于是他们俩早早就订了婚。之后，曹聚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1921年学成毕业后，回到老家和王春翠举办了婚礼。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王春翠做了赫赫有名的曹家的媳妇后，并没有开始阔太太的生活，而是继续求学，毕竟她才17岁。开明的曹家也没有将她拴在灶台边，支持她继续念书。她考上了杭州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，是当时县里第一个女师范生。与此同时，曹聚仁前往上海爱国女中教书，两人开始了异地分居的生活。

曹聚仁到上海后，其聪明才智得到了极大的发挥。他在教书的同时搞研究，写作，办刊物，创办了《涛声》《芒种》等刊物，为《社会日报》写社论，为《申报》副刊“自由谈”撰稿，还因为整理章太炎先生的《国学概论》而成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，与鲁迅先生也交往甚密。一时间成为上海文化界的活跃人物。

最初，分居两地的曹聚仁和王春翠信件往来频繁，互诉衷肠，互相交流学习和思想。但渐渐地，曹聚仁的信愈来愈少，也越来越短了。王春翠敏感地意识到他们的婚姻有了危机。丈夫是如此的年轻英俊，才华横溢，又在女中当老师，没有诱惑是不可能的。王春翠决意放弃学业，奔赴上海挽救婚姻。到达上海后，她的隐忧被证实了。但她不吵不闹，一如平常的用心照顾丈夫的日常起居，并协助丈夫创办《涛声》杂志，做校对，搞发行。与此同时，努力开辟自己的事业。她在上海暨南大学师范附小任教，也开始写作。处女作《我的母亲》，发表于《申报·自由谈》副刊。

王春翠的贤淑和才华，打动了曹聚仁，曹聚仁辞去女中职务，夫妻二人和好如初。1926年，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取名曹雯。女儿的出生，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喜悦，他们对这个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疼爱。在一张老照片上，我看到曹聚仁抱着曹雯，小姑娘非常可爱，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梁，白皙的皮肤，如同一个小天使。

不幸的是，1932年日军入侵上海，曹聚仁在上海郊区的家被摧毁，什物书籍，荡然一空。女儿在躲避战火的途中病倒，由于交通不便，良医难寻，最后不幸夭折。六岁女儿的离世，对夫妻二人打击巨大，王春翠一时间心如死灰，曹聚仁也觉得如同世界末日到来。他痛哭道：“好似天地都到了末日，我这一生，也就这么完蛋了。”

承受着无边悲痛的王春翠，靠写作疗伤。她写下了《雯女的影子》一文，发表于《芒种》杂志。1934年，她又完成了散文集《竹叶集》，书名是鲁迅先生亲自选定的，曹聚仁为她作了序。1935年10月，她还以谢燕子为笔名，编著出版了《戏曲甲选》。

繁忙的工作和写作，渐渐抚平了王春翠的伤痛。她又燃起希望，她觉得自己和丈夫还年轻，还会再有孩子的。不料，他们的婚姻再次出现危机。这一次，王春翠心灰意冷，没再做任何努力。她孤身一人离开上海，回到了兰溪老家蒋畈村。

王春翠回到蒋畈村，回到了曹家。毕竟她还是曹家的媳妇。她尽力照顾曹聚仁的父母，更重要的是，她接手了育才学堂，当了女校长。此时，育才学堂的创始人曹梦岐先生，早已离开了人世。他的长子曹聚德和三子曹聚义，先后接任过校长，又先后因为参加抗战而离开。

王春翠接手育才学校后，满腔的热情喷薄而出。首先提出减免学杂费，动员农家子女就学。她迈动着一双小脚在乡村中奔走，呼吁。她一分钱不拿，毫无杂念地办学，将乡村教育视为生命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为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，提高国民的救国热忱，王春翠组建了“育才小学剧团”，自编自导了《黄河大合唱》《我们在太行山上》等节目，去各地开展抗日演出。1938年秋，他们在晒谷场演出了抗战话剧《一片爱国心》，引起强烈反响。当局要求他们摘下“救亡”横幅，遭到王春翠严厉拒绝。她还创办了《育才学刊》(共200余期)，传播文明，宣传抗战，影响甚广。

与此同时，再婚后的曹聚仁也没有沉溺在小日子里，而是继续从事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事业。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，曹聚仁“脱下长袍，穿起短装，奔赴战场”，拿起笔做刀枪，写下了大量的战地新闻、人物通讯和杂感，部分内容还被编入到战时教科书中。我们在电影《八佰》里看到的那位深入到四行仓库保卫战战场的记者，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。

夫妻二人虽然分开了，却没有背道而驰，而是成了抗日战场上的战友，以各自不同的方式，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贡献着自己的青春热血。这应该是我们看到的最好的结局。

尤其是王春翠，离异并没有让她变得愁苦脆弱，她像一名勇敢的战士，投入到了战斗中。1940年春，为避日军侵袭轰炸，王春翠带领师生们隐蔽到山林中继续上课。1942年5月，日军入侵浙东一带，山林里的学校被日军炸毁，他们不得不停课。但第二年稍有安宁，她又立即让学校复课了。复课之时，适逢育才小学建校40周年，她组织学校大庆三天，以提振师生士气。但好景不长，1944年夏，日军飞机再次轰炸，育才校舍又一次被夷为平地。王春翠依然不放弃，她借用祠堂、庙宇及闲房等继续办学，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做小脚先生。

抗日胜利后，王春翠马上着手重振育才小学。而且她还发愿，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校舍，增设中学部。为此她四处募捐，筹款，并写信给曹聚仁请求支持。其实这也是曹梦岐老先生的夙愿，曹梦岐在世时就一直想办中学部，故曹聚仁等曹家兄妹都很支持。他们联络当地名流，建立育才中学校董事会，筹措经费，用以创立育才初级中学。1947年，育才学园终于恢复了，小学部、中学部同时开课。曹聚德任中学校长，王春翠任小学校长。

我从育才学校的历史沿革中看到，王春翠自回到故乡接手育才学校后，没有过过一天安生日子，但也没有停止过一天办学。她让读书声穿越贫困，穿越战火，在山区乡村回响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在这漫长的艰苦卓绝的岁月里，完成了她从曹王氏到王春翠的转换，成长为她自己，一个大写的女人。

育才学校停办（合并）后，王春翠回归乡野，做回了农妇。在蒋畈村乡亲们的记忆里，晚年的她时常独自坐在门前，白发在风中飘拂。但凡有孩子路过，她总会问及他们的学业。闲暇时，她还主动教左邻右舍的孩子认字读书，并告诉他们，没有文化哪里都去不了。

改革开放后她担任了兰溪县政协委员，写下不少回忆文章，如《我的丈夫曹聚仁》《回忆鲁迅》等。1987年病逝，归葬蒋畈墓园。

我久久地看着王春翠那张白发如雪的照片，在心中穿越百年时空向她致敬。我在她的脸上看不到愁苦，看到的只有温和平静，以及平静下的坚毅。她一生致力于办学，一生都在坚持求真知、立真人的“蒋畈精神”。任育才学校校长期间，她8年不拿薪水；改成公立学校后，她便将所得工资薪金，全部用来给学生做奖学金。她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给了乡村教育事业，她因此被乡邻们尊称为“王大先生”。

王大先生，多么响亮的称谓！从小脚先生到王大先生，从曹王氏到王春翠，她的生命开出了馨香的花朵，犹如山涧的一株兰，虽然没有艳丽的色彩，没有浓烈的香气，也没有如雷贯耳的大名——倘若不是走进蒋畈村，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她。但她的馨香，却永留人间。

所谓流芳百世，便是如此罢。

写于2021年深秋

笔会

记录

百花齐放

（国画）

王雪涛

『小开』学者

夏岚

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，国人虽尚无自由旅行之便，但学者们出国的机会开始多起来，开会访问，交流参展等等，中日学者间的往来颇为频繁。我们客寓东瀛，稍谙地理人物，老师同学朋友来日本时，往往光临寒舍，蓬荜真的生辉。我们自任驻日办事处办事员，接机送机，公干之余陪着观光购物，鞍前马后，不亦乐乎。

俗话说隔行如隔山，外子的客人中，历史学界学者来得最多。本是无缘接近的人，在国外得到走近的机会。坚硬的学术内容背后，那些有故事有热情的人，让我看到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价值。

王文楚先生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教授，个子不高。那年来时，估计西装是新赶做出来的，穿着还有点不自在的样子。不穿西装的话，他就是你在上海街头很容易碰到的那种和善的小老头。陪着外面行走，王先生风物景致看得很认真，对日本学者做学问、过日子的方方面面问得也很详细。当时中日间生活水平差距不小，王先生听完说明，大多数时候颔首不语，偶尔摇摇头，叹息一声。一日家中便饭，我做了黄油煎三文鱼，蘸着蛋黄酱吃。王先生不习惯盘腿坐榻榻米，就坐椅子上，身子比放菜的桌子还高，一下一下弯腰夹菜，不以为苦。外子笑：大马哈鱼，据说要部长级才能吃到。王先生道：阿拉小辰光常吃呀，后来才吃勿到。

这位面容和善的老先生，1949年前是养尊处优的“小开”，三文鱼当然不在话下。也因为是小开，小时候曾经被绑过票，问起，说关在申江饭店（今天的扬子饭店）里面，父母交了赎金，绑匪就把他带到饭店外的马路上解放了。听者惊心动魄，本人却风清云淡：倒蛮讲信用呃。说别人的故事一般。

邹逸麟先生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达十年，还曾连续三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。日本朋友说，哇哦，国会议员级啊。记不清邹老师来过日本几次了，感觉大概隔两三年就会来一次。有一次因为出国手续阴差阳错，会议的前一天还没拿到上级批复。会议当天他拖着行李去市外办，想拿到批复就直奔机场，结果上面坚持“规定”不予通融，邹老师终于未能成行，我们这边也就无机可接了。

巧，邹老师也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“小开”，头发随时梳得齐齐整整，衣服挺括，背伸得直直的，声音浑厚，举手投足之间有一股优雅劲儿。师母端庄美丽，两人在一起——学生辈这么说虽然大不敬——真的画一样。有一年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去看邹老师，被两位老人的温和可亲感染了吧，告辞时孩子竟不肯走。邹老师看我们还要去办别的事，就说，小人放我这里好了。等回头去领孩子时，一老一小再加师母，三个人一地的玩具，玩得正高兴呢。离开时快深夜12点了，邹老师依然笑容可掬：好白相，再来啊！这事长大了说给女儿听，她感叹说，国会议员级的Baby-sitter，太高级了！

邹老师的学问我不懂，但他的兴趣、关心事远远不限于学问，所以我们聊起来一点不“隔”。离开学问，离开史地所的杂务，他说起1940年代上海话剧史无前例的繁荣，说起抗战胜利后在大光明、国泰追看首轮好莱坞影片：哎哟，有劲哦！少年时的记忆是鲜明的，他仍然能用英语说出那些电影和明星的名字。我读过话剧史，读过中国电影史，邹老师就是那段历史中的观众啊，他让历史变得真切鲜活。

他问我：黄佐临还导戏吗？（黄佐临抗战时期在上海剧坛非常活跃，导演的《梁上君子》《夜店》等都很卖座，时与吴仞之、费穆、朱端钧并称“四大导演”。）现在好莱坞明星啥人最红？多年不看小说了，最近什么小说好看？日本年轻人现在听什么音乐？他说话时认真地看着你的眼睛，不插话，静静听完才说：格么……

再有一巧，复旦历史系毕业的王文楚先生和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邹逸麟老师，年轻时都被分到了北京，同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。他们说，工作环境是好，但生活不习惯啊，所以总想着往南调。1957年，受吴晗邀请在北京主持编绘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的谭其骧先生回复旦继续编图，便把两个年轻的南方人带着一起雁南飞了。两位先生从此落脚复旦，潜心历史地理研究，干了一辈子。

话说谭先生，外子出国前是他的工作助手，我由此得知老先生的一个雅趣：爱听爱唱昆曲。谭先生和周有光夫人张允和熟，他们时常电话、书信谈曲论艺，周夫人在北京主持的“昆曲研习社”，有不定期出版物，每期都寄给谭先生。一直到晚年，谭先生还每周一次约上海昆剧院的笛箫师来家拍曲，兴趣盎然。1992年夏，我代外子去华东医院探望病重的谭先生，谭先生迷迷糊糊中可能认出了我，突然泪流满面。那以后不多久，先生就仙逝了。愿天国也有先生心爱的昆曲。

2021/10/08 于大阪

『文汇笔会』微信二维码

普莫雍错边的推寺

王叔重

普莫雍错边有个寺，我叫它推寺。推寺的原名很长，叫推甘丹托门林寺，推寺，是我懒人的叫法。当然，一路上聊起推寺时，我就这样叫，倒也朗朗上口。大伙儿姑且就这么叫了起来。

我们逐日行驶于湖山之间。湖，有的是无折角的大线条。山呢，则是一层又一层连绵不断的清晰分明的外轮廓线。到了每一处最高的垭口，往下望去，还有一圈圈数不清的壮观的盘山公路线条。人绝少，更多的是牛羊或野生动物。牛羊可以上山，头不抬地在吃草。

推寺，原先可不在我们的行驶路线上，却因路遇一喇嘛搭车，便绕着路到了这里。喇嘛和普通藏民一样，皮肤黝黑，但身材矮小，并没有我来前想象中的藏民的魁梧。他上车时，我便觉得他和我父亲有些相似，只是藏区和内地的区别都写在脸上。

他操着简单的汉语，不时地回头往我们看，眼睛一对上就转回头去。不长的路程，他竟然这样二十几次之多。当然更多的时候，他是正面和藏民司机无杰东扯一句西说一嘴，感觉熟悉得很，这我可就听不懂了。

推寺在推村，这不稀奇。

推村紧挨着普莫雍错，海拔5070米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行政村。推寺就在村子最靠近普莫雍错的悬崖峭壁边。在推寺的四周行走，恍惚间如来到了古罗马的历史现场。这让我想起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豁然开朗地意识到的：“我们在自己这个世界正经历着的事情，修昔底德在他那个时代早已经历过了……他和他那一代人就走在我和我这一代人的前头，我们分别抵达了历史经验的现场。事实上，他的现在就是我的未来。”我们当天夜宿的洛扎县，就有建于悬崖上的杰顿珠宗城堡遗址。一路西行，途中常见到山巅或湖边悬崖上的残破的城堡遗址，都会让你有这种在历史里的感觉。而只有推寺的存在，是活着的，就是我们的现在和未来。

推寺的左手边可以看到我们刚经过的蒙达拉雪山，寺后就是念青康桑雪山，正对着的则是我爱的库拉冈日雪山。

去推寺的路上，必然要先经过吉乌寺。吉乌寺在冈仁波齐和纳木那尼峰脚下，在玛旁雍错边的悬崖上。吉乌寺的位置，常人的眼光看，指定是胜过推寺的。我在短暂的二日内前后两次瞻仰吉乌寺和推寺，可我还是心向推寺。吉乌寺被安静地安排在湖边，推寺却像极了在海上，漂浮着。吉乌寺是所有人的圣地，而推寺是属于我这种少数人的。

车行驶到普莫雍错对面看过来，推寺像悬在普莫雍错之上。湖水的绿与天空的蓝连成一片，却似被推寺的红墙划开一道口子。

我不知道“托门林”是什么意思，或许就是这天与地之间的一道门？这在神山圣湖边的天与地之间的一道门，推开来，便是另一番世界：佛陀在这里，宗喀巴在这里，僧侣从众在这里，你我也在这里。

昨天，我和含素在布达拉宫时，便有看到占整面墙的藏经橱里满满当当地摆放着《丹珠尔》和《甘珠尔》，它们共同属于古象雄王朝的《象雄大藏经》。早在1409年，拉萨的达孜县，就由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亲自筹建了甘丹寺，寺内仍存有由纯金汁书写的全套藏文《甘珠尔》和《丹珠尔》。推寺，为示尊重，竟把两部经名囊括进寺名中。

喇嘛告诉我，推寺有八百多年了，但今天却只有他在内的两个喇嘛。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存在了这么久意味着什么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八百年已经让推寺与普莫雍错和雪山融为了一体。

后来在扎什伦布寺，我认识了一名小喇嘛，十七岁，出家已五年。我加了他的微信。我问他，知道推甘丹托门林寺吗？小喇嘛回我说，不知道。但问我，是在江孜县，还是浪卡子县？面对他的猜测，我感觉推寺真似在桃花源里，并不为外人所知。

夜间下起了小雨。第二天，车子一直行驶到我们此行经过的最高处——海拔5363米的蒙达拉山口后，雾方散开，推村的推寺就忽现在我们眼前的普莫雍错之上。

我们再一次返回推寺。

在村口，我和老杨下了车，径直走向普莫雍错边上的推寺。

推寺很小，主殿也只有二层小楼。第二天再经过的时候，喇嘛对我们已不再陌生，这才打开二楼的小门带我们上去。屋内暗沉沉的，透过外光，并在喇嘛的微弱语气的汉语绍介下，知供的是宗喀巴大师。二楼下来，瞻仰一楼供奉的莲花生大师，依然只能通过洒进来的外光才能看得大概。我们都捐了些功德，这是藏民司机的好意——这些小庙比不得拉萨的大寺，更需要每一个或大或小的善举。我没有许愿。只是昨与今，一偶然一必然地二次经过，且对她的存在暗自赞叹。

我和老杨说，过段时间，我们可以来此小住。静心的同时，左手库拉冈日雪山，右手念青康桑雪山，都可以入我画。喇嘛允诺了我挂单的请求。

推寺是我驻足过的船，似乎在这天地之间并不重要。推寺是推村人的船，是普莫雍错里的船，是内向宗教的船，是第三极中的船——荡漾在时间和空间交织中的船。当然，我更渴望她仅是一只小船——知与不知她的存在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我并非南阳刘子骥之流的问津人，而欲做误入的武陵捕鱼者。

或许要倒过来说，你、我和推村，还有这些雪山湖水，都成了推寺的船。一叶叶扁舟，都系在她的门闩上。这样，在开门与关门的时候，精神与现实之间，生灵才得以在涂炭中延续！